

## 国民党在918后的东北活动

来源：参考消息 时间：2012-9-25 20:34:55 作者：

对于918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大陆的传统做法是以国府表面上的暂时的不抵抗，来完全否定国府所做的一些抗日努力。但现在以中国和日本朝鲜的档案来看，当时中央不仅曾以自身的实际力量逐步细致的进行抗日活动，还直接以资金和武器资助过东北的抵抗力量。

第一，国民政府表面上的主要态度是不抵抗，这是当时情况之下军事上外交上的一种策略，这是能够看得到的一面。国民政府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是无法对抗日本的，并且蒋早年曾去东北考察过，认为东北的各种关系复杂，不能草率处理。得出了“东北是国民革命的终点”的结论。这种观点对蒋影响很深，直到后来的《敌乎？友乎？》和其在军队内部一些的讲话仍可看到这种思想。于是蒋和中央认为一边安内一边依靠国际联盟处理东北是当时情况之下最有效的办法。不过这不是国府所做得一切，暗地里中央却正准备抗日得具体方针。以下要具体说明国府如何准备具体的抗日方针，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抗日政策与东北义勇军的某种联系。

918事变后一周（9月25日），蒋介石发了一份行政院密令字第4852号《各级党部指导反日救国行动工作纲要》（1），该文上具体命令友救国行动方面的指导，调查，宣传，通讯四个部分。

该文的指导方针谓：“各级党部应指导当地原有之民众团体组织反日救国会”，“应斟酌当地情形拟订实际行运计划商承当地高级党部之准许后努力实行”。虽然各级党部委员及全体工作人员应一致参加反日行动工作，然而在“各地反日救国会活动时对日本商店及日人不能捣毁殴击”。这是因为对于日本人的商店及跟日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上，尽量避免冲突而不要引起新的问题或在这些问题上不要给予日本人把事情扩大的口实。在如上的指导方针下，“各级党部及各地反日救国会与各民众团体应组织宣传队轮流分发演讲及散发宣传品，其宣传大纲或要点由当地高级党部密令颁发之”。加上“各地宣传队应编制剧本，组织新剧团及化装演讲队，描写日本在华暴行，以换取人民之注意”。这是非常具体的命令，它指导人们如何组织抗日队伍，而且如何运作其组织，又用何种方式去宣传抗日而引起人民的注意。

虽然以作者手中掌握的资料不能完全保证这份密令通知到全国所有党部，也不能断定所有党部工作人员都确实执行了此命令。不过从这份密令可以推测，918事变以后的蒋中正和国府不是完全采取不抵抗态度，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军事力量，在逐步推行其抗日意志。我们看到行政院命令中不仅有抗日活动以及抗日团体指导的问题，而且还具体谈到如何调查“日本人的行动”以及“特务工作”方面的事情。命令中说，不但“各级党部及各地反日会应严密组织日本在华工厂洋行公司各地领馆及其他机关服务之中国员工侦察”，而且“日人一切行动及其诡谋随时密报”。担任调查工作者还要“于各种集会时负纠察责任并严缉奸细”。如上所述，调查工作不仅仅限于日本人与日本的特务工作上，而且在日本人的机构里工作的中国人也成了被调查对象。这意味着他们的调查工作做的更严密更彻底。

为了更圆满地处理与扩大抗日救国活动的影响，“各地党部及反日救国会应特设一通讯组负责通讯之责”。“各地通讯组应负责将该地工作情形随时报告上级党部”，“将各地反日消息汇报新闻发表，唤起民众之注意”。因此各地国民党党务工作委员会，扮演了国民政府与一般民众地抗日活动的中介者或联络点的角色。

综上所述，从这份行政院的密令可以看出，918事变以后的国民政府不能说是完全不抵抗的，在内部工作中还是作了抗日的准备的。国民政府虽然表面上没有积极带动东北义勇军抗日，但在内部的抗日政策和工作上等方面，对东北义勇军活动以及鼓吹民众的爱国思想上还是起一定作用的。

第二，要了解国民政府与义勇军抗日活动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工作如何。918事变时国民党党务办事处在东北的事实说明，在国民政府与义勇军关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国民党在东北已有了相当的发展”（2）1925年中国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以朱霁青为中心积极推动东北党务工作，1927年钱公来以教会为活动场所鼓吹革命，这时的党务工作因东北当局的高度统治，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东北易帜后，东北的党务更是蓬勃积极的在发展。但东北党务公开活动时间不到两年，9.18事变后又随军事撤退，1932年东北各省市党务执行委员会办事处（简称东北党务办事处）成立于北平。

虽然国民党党务在东北公开工作的时间短暂，不过党务执行委员会1932年到北平之前还在执行工作。因此东北党务办事处在东北存在的事实于1931年9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命令组织抗日活动的事实，肯定又一定的关系。

东北党务办事处到北平后，奉命集合东北各省特区党部指导委员会为委员，并且指定张学良，梅公任（佛光），周天放，彭济群等为常务委员，书记及干事，均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指导东北地下党务工作及义勇军抗日作战。1935年受日军胁迫停止东北，华北的党务活动，东北党务办事处迁至南京，但并没有停止东北的党务工作，另由中央指派专员到东北现地从事党务工作。当时的党务机关甚多，“有辽，吉，黑，热各省党部，铁路党部，蒙旗党部，东北协会，三民主义青年团，救国会，调查室和交通站”（3）等单位。

1937年国民党中央改组东北党务办事处，划分辽，吉，黑，哈为七区，每区指派委员一人，干事二人，联络员若干员，各委员到现地指导工作。1939年为了加强东北的党务工作，运用双线领导制。于正式的省党部干部外，配上特别党部“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如某一系统遭受破坏或打击，另一系统仍可继续展开活动。1940年在东北共设立“县党部150处，吸收忠贞党员2253人”（4），1944年仅在“辽宁省有62支部”（5）。东北各省县市党部，特别党部都是地方正式党部，均受中央东北党务办事处之指导和节制。在东北的党务工作以反满抗日为目标，活动项目主要是结合当地的爱国青年，发展组织就地抗日，伸张民族大义，以保民族生机。工作阶段划分为秘密，半公开，公开三各阶段。工作纲目除一般的组，训，宣，调，民运之外，再加上因应现地需要的文教，军事，爆破，交通，经济建设等五项，共为十个纲目。将伪满洲国分为12部，作为工作对象的划分（6）。

如上所述，东北党务办事处的反满抗日活动不断展开，多次发生了可歌可泣的事件。其中有“1936年的安东事件；1941年12月30日事件；1944年的三省党部事件（重庆派国民党之对日满攻势（7））；1945年的五二三事件为最大”（8）。在每次事件中都有党人流亡，蒙难以至于殉难，约计有数千人以上。总而言之，从东北易帜到1945年间东北的党务工作及抗日活动没有间断过，这是由中央政府的命令与中央政府的整个抗日政策配合之下的部分措施。

第三，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918事变前后，国民政府军总司令蒋中正保持尽量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态度。这在当时及其后，成为海内外批评蒋不抵抗的主要依据，甚至是西安事变的远因。但是根据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的资料，却有如下不同的文字记载：“1932年汉口会议后，蒋介石与张学良采取积极抗日之对策，整顿原有的义勇军组织。该年底在南京召开三中全会时，蒋介石给予张学良收复失地的大权，积极予以援助。张学良则考路 在义勇军之指挥统治体系中，把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扩大，将义勇军组织分为10个军团。至于是否支援义勇军的军费，则由后援会调查后决定。给养方面，则由蒋介石（南京政府），华侨及其他与国民政府有关者掌管。蒋，张两人在汉口会见后，彼此达成东北失地收复计划，大体如下：一，基于新组织的情况，作战兵力以第一至第十军团及苏炳文军为主力。二，开始作战时间是在我军完成补给准备之后，日军彻底实行增兵作战之前。三，以齐齐哈尔，哈市，长春，吉林为主要作战区，其目的在夺回主要都市及街道；为了夺回奉天，奉天以南铁道地带则为次要作战区。四，预备热河军队，以确保热河省为补给上的根据地。五，以北平及天津为补给上的主要根据地”（9）。除了以上的文字记录外，还附了一张义勇军组织表。

在汉口会议中决定的东北失地收复计划是非常具体的，不但讨论了经济援助的来源，而且还谈到了主要和次要的作战地区以及军团的将领。国民政府讨论抗日的事实不仅在日文资料上，还有中文资料上也能发现。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一些内容均围绕着抗日问题来讨论的：“一为政府速集重兵于热河冀北，出兵收复失地。二为以政府力量援助义勇军。三为以本党与政府的力量指导国民排斥日货。四为断定国联美国无力解决此问题。”（10）。虽然国民政府具体讨论了这些抗日问题，但怕引起一些新的问题而未公开发表。国民政府与抗日活动政策有关系的事实稍微传出后，就马上发表“政府负责发言人表示绝对否认16日大会中有此种决议”（11）。这应当理解为中央当时的一种策略而已。

跟以上内容较类似的另一个资料为，根据从新京来的可靠消息而在满洲日报上登载的内容：“汤玉麟的反满态度与

张学良完全结合，决定在朱庆澜的总指挥下编成义勇军九团“（12），还组织抗日自卫团，其活动费用均由张学良与南京政府处理。1933年1月开始中央政府每月援助30万，对于其他义勇军每月援助12万左右。”（13）从这些资料可以判断当时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而且能窥视国民政府通过各种计划收复东北失地的期望。当然若仅仅是抗日计划而不作出积极的抗日行动，从整个抗日政策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不过有没有这个抗日意志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了积极的抗日政策与抗日意志，才能做出积极的行动来。

第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还有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北平军事委员会均受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北平军事委员会的活动有很多种，其中较明显的是“满洲情报组”的活动。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934年派遣了“满洲情报组”（14），这是为了加强搜集满洲情报。派林世昌（吴世昌）为驻满情报员，以新京为根据地活动。4月以后为使对满谍报网进一步扩大，由军委分会情报组组长陈楚雄又编制政治，国际，军事，地方政情4个组。情报组的人员编制如下（15）：

#### 政治组

组长：张之杰（前冯庸大学校长）

副组长：刘震华（南京军事学校第八期毕业，保定行营谍报科副主任；东北军旅长刘震东弟弟）

组员：于子臣（宪兵第三团上士）

韩桂林（宪兵第三团上士）

徐景春（军分会政训处调查员）

祁山风（军分会政训处调查员）

马少祥（宪兵第三团上士）

周焕鸣（军分会政训处宣传员）

柳生春（第25师少尉副官）

雷厚生（第51军特务连上士）

魏家旗（军分会政训处情报员）

栲鸣宝（平津卫戍部高等密探）

梁道保（军分会政训处计练员）

赵镇（宪兵司令部高等密探）

张鸿礼（军分会政训处情报员）

贾有发（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傅兴查（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 国际组

组长：王玉彬（中俄交涉代表团“莫德会”随员）

副组长：何秀生（美国留学，分外事组组员）

组员：郭能直（华北日报外勤记者）

汪伯平（冯庸大学学生）

伊吉天（冯庸大学学生）

董兰祺（女）（冯庸大学学生）

丁兆珍（前吉林省立第一中学教员）

杨乃春（北平实报记者）

徐秀达（军分会情报员）

苏桂林（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李枋枷（中央通讯社记者）

黄金涛（军分会情报员）

魏海文（北平老实话记者）

陈孝雄（军分会情报员）

王兆悖（军分会政训处政治训练员）

黄宪文（冯庸大学学生）

顾毓秀（北平卫戍部外事交际员）

军事组

组长：郑天泉（军分会高级参谋团少校参谋）

副组长：赵烂私（军分会第三组组员）

组员：越长文（宪兵第三团高等密侦）

郑春华（军分会情报员，以前赴满工作）

许泉水（北平公安局侦缉大队）

刘大成（军分会情报员）

李少清（军分会政训处谍报员）

王云（军分会政训处谍报员）

庞能训（军分会情报员）

张李和（军分会情报员）

汤士彬（军分会情报员）

窦玉山（第百十五密探）

程兴华（天津卫戍部）

宋文（军分会情报员）

谢原贵（军分会情报员）

章沽河（第二十五便衣密探）

苏兴业（天津卫戍部密探）

地方政情组

组长：金元会（旧东北讲武学堂第二期学生；东北边防司令部少校参谋）

副组长：载鸣霞（军分会高级参谋团少校参谋）

组员：骆春和（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庸盛华（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尹贵增（平津卫戍部办事员）

李清田（前奉天省党部联络部员）

徐骥

鲁维方（现在东北四省党务办事处科员）

王治玉（平津卫戍部谍报员）

曹土城（前吉林省党部训练员）

叶宝霜（东北党务办事处职员）

王义德（军分会情报员）

沈领运（军分会情报员）

杨浩然（宪兵第三团特别党部科员）

王廷栋（军分会情报组组长）

猪义江（军分会训练处）

房土桂（前奉天省党部组织部员）

交通：于得水（天津人，30余岁）

王约翰（北平人，20岁余）

传员：徐立生（山东人，30岁余）

赵文元（山东人，30岁余）

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政治调查组，于新京，奉天，大连各置组员5名，以新京为活动中心；国际调查组，驻哈尔

滨，以该地为工作中心地；军事调查组中心地，于新京，奉天，锦县各置组员5名，以新京为活动中心；地方政情组，配置于奉天，新京；交通专员，置于大连市西岗子，各组员并不永久驻于指定地点，随时转移，以便隐匿行迹。

他们为了谨慎活动，到东北的时间都不一样（16），全以伪名工作，且随时变换，两星期变姓一次，每星期变名一次，其名字由组长预先安排按表变换。情报传送时，一为大连西岗子交通处负责东北至北平间交通联络，在大连市西岗子机房内设交通处置专任交通员4人，在东北的情报员一切报告先送交通处再转呈北平。二为组置交通员1名，于大连交通员施行交通通信。报告书之制作法，使用药液写于纸上，干后，药水文字完全消失如白纸一样，更于行间书写商业通信字样，故如何检查亦不易发现。该“情报组经费每月8万5千元”（17）。根据《满洲日报》，“在辽西，热河北部活动的义勇军5万人中分50班，其中16班属于北平绥靖公署。其主力部队在锦州，朝阳方面活动，每月活动费70万，其他部队分为甲乙丙丁四级，每月4万到7万不等的活动费。”（18）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活动，可以说明国民政府当时的抗日政策时多种的，全方位的。

第五，国民政府协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东北地区活动的一些抗日组织。国民政府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间合作成立的抗日组织为“中韩互助联合会”，这是南京着呢辜负侨务委员会会长陈树人及韩人金九等策谋，以反满抗日之工作及暗杀日满要人为目的，1933年8月29日于南京组成的（19）。该团体组织在国民政府暗中援助于指导下，“孙科已经给与了活动费7万元”，全部的“活动资金为120万元”（20）。其活动的基金是，以中国内外侨民之捐款及伤害义勇军后援会之资金来充当。外交部长宋子文已具长期抗日之决意，但不现于表面。

中韩互助联合会的活动目的，一为收复东三省及热河之失地并援助朝鲜独立，同时组成暗杀团暗杀日满要人，制造伪满洲国的治安混乱。二为确立华北及伪满洲国之通讯设备，同时由苏俄购买武器子弹供应北满韩国独立军与中国义勇军。为了活动的方便以及图谋准确性，在伪满洲国内26各通信处搜集情报。当时“受该会的命令二潜入伪满洲国活动者已有230名左右，其中朝鲜人82名”（21）。

其活动组织结构，有管理组，财政组，事务组，宣传组，计划组。各组设组长一，副组长一，谋长三，主任二。成员表如下（22）：

会长：陈树人（以前与孙文一起参加中国革命，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及广东生长，现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副会长：金九（朝鲜人）

会员：梁寒操（孙科代表，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及立法院秘书长）

曾仲鸣（汪精卫代表，现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

李梦庚（于右任代表，现任监察院监察委员）

黄仁霖（蒋介石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现任南京励志社总干事）

武母忱（杨杰代表，现任陆军学校总编辑）

黄慕松（何应钦代表，现任参谋本部次长）

杨德照（陈济棠代表，现任广东省驻京办事处处长）

张保龄（新加坡华侨代表，现任新加坡中民商会主任）

伯仁（朱庆澜代表）

吴焕章（马占山代表）

陈赞辉（上海市省会内民众自卫会训练会主任）

安泰根（朝鲜人，安重根之弟）

王海公（朝鲜人，现任南京驻华鲜人民会会章及审计部长）

周志韩（朝鲜人，鲜人第67军司令部王以哲部上校）

第六，国民政府海指派一些人到东北地区工作，主要目的是捣乱东北地区的治安。国民政府实际上派人去东北工作的例子非常多，如：1932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了“驱日敢死队”（23）的干部指挥，他们在东北各地从事宣传；于1934年12月派蓝衣社社员左兆奎（二十五六岁），申炳南（二十八九岁）2人赴满工作。“于北满铁路东部横道河子一带，利诱该处的‘无赖徒’及小帮‘胡匪’破坏铁路2次”，“于4月23日该2人...赴南京报告工作状况...后复将入满工作”（24）。“接受蒋介石意思的蓝衣社员30名，在队长梁佐华指挥下入满，主要企图从事捣乱满洲国治安方面”（25）。象以上的工作者一样，受国民政府的命令到东北的活动者，不仅试图搅乱东北治安，而且尽量组织东北的党务工作者从事抗日活动。

除以上的各种抗日活动外，国民政府蒋介石还批准抗日活动的将领之任命于援助抗日活动将领之活动费用。9.18事变后国民政府虽没有明令抵抗，但实际上对参加抗日活动的东北义勇军是给予援助的。国民政府蒋介石不仅任命与承认东北的抗日政府（26），而且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尤其是马占山的抗日活动给予很大的鼓励，甚至发电报奖勉（27）。电报谓“我方采取自卫手段，甚属正当，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摧败顽敌，保全疆土，....，为民族争存”（28）。“我军连日奋战，为国争光，威名远播，中外钦仰，甚堪嘉慰”（29）。蒋介石还知道马占山部需要军事上的援助，谓：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30）。蒋介石对东北义勇军之活动是关心的，是细心安排援助的。

蒋介石与张学良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在关于抗日援助以及围绕抗日的重要问题上，是需要蒋介石的同意与支持的，若没有蒋介石的支持与默认，张学良的很多抗日工作就做不到。但不一定所有的情况都向蒋介石报告请示，有些情况当然石张学良自理的。

从有些研究与资料中明显看出，张学良对东北义勇军组织有支持与援助（31）。尤其是经费，“大部分的义勇军活动基金从张学良来的”（32）。但实际上张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应该把这个问题与当时蒋介石河张学良在政治上的不同利益与实际势力的强弱不同来对待。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蒋介石有明显的双重政策，即一面在暗地里支持与默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另一方面又公开压制要求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是蒋认为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较好办法，希望透过双重政策达到圆满的结果。当然，这也成了部分人攻击蒋卖国与不抵抗的证据。

蒋介石在东北义勇军之抗日问题上支持过的例子非常多，在此举几个例子来分析。：马占山南下后在河南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张学良向中央政府呈请以马占山任命第十师长...一方取得蒋介石的同意”（33）。一般的情况认为，任命东北军职务的事完全可由张学良自理，但张在任命自己部下谓抗日重要将领时，还要请求蒋介石的同意，显然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安全与整个政策配合的问题，张学良不能自己任意地处理。因此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在东北抗日问题上由非常紧密的关系，不过蒋介石不愿出面公开讨论抗日的问题，一些事情就由张来处理。

蒋对东北义勇军在经济上，武器上的援助也非常多：“马占山曾受蒋介石5万元之援助”（34）；“南京政府从抗日工作中支付20万元，现已支付了5万发将兵之薪水，士气旺盛”（35）；南京政府令朱庆澜组织义勇军司令部，蒋介石想透过朱庆澜把东北地义勇军势力统一起来，军费由军政府支付；又“由上海兵工厂援助朱庆澜步兵子弹200万发，手榴弹3万枚，机关枪48挺，迫击炮20门与炮弹1万枚”（36）。

一些东北义勇军将领有机会或有目的的到关内时，尽量与国民政府机关东北四省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及在北平的张学良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点以及援助。东边道义勇军总司令唐聚五军事受挫后临时住在北平期间，同时与汉口和南京保持密切联系。1934年唐奉南京政府的命令组织东北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唐在北平期间不但召集旧部，而且还组织了别动队（每月活动费20万元），唐聚五的部下是孙秀岩，王育文，张宗周，李春润等（37）除了唐部以外，受南京政府支持和援助的还有：东满地区吴义成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东边道地区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通化地区邓铁梅领导的义勇军；北满有双龙，张禹亭领导的东北光复联合军，中国革命军和东北军；吉林地区三江好领导的救国军；东边道赵同，白君实所率领的东北少年铁血军；在奉天，吉林地区游击的由崔荣山领导的铁血救国军等等（38）。下面是由当时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编写的材料，由此可见当时义勇军大规模的抗日行动：

作战时间 主要战役名 日伪兵力 抗敌部队及兵力 摘要

1932年3-6月 反吉林军讨伐战 7000 反吉林军（李杜，丁超）；2万 压迫吉林省北部的反吉林军，确保松花江水路，回复依兰；

1932年5-6月 第一次东边道肃清 4000 唐聚五，王凤阁；2万 通化唐聚五与大刀会王凤阁合作；

1932年4-7月 马占山讨伐战 5000 马占山系；1.6万 马占山进攻海伦；

1932年5月 李清海讨伐战 6000 马占山第二路军李清海；1万 回复肇东，扶余县；

1932年6月 冯占海讨伐战 1600 冯占海；1500 于榆树县交战；

1932年7月 李清海残部讨伐 1500 李清海残部；1500 将兰西县一带只李清海部队击退；

1932年6-7月 第二次冯占海讨伐战 7000 冯占海，宫长海；.5万 肃清双城，阿成，榆树，五常，舒兰等地；

1932年8月 蒙部讨伐 2500 胡宝来，黑炮头等；2000 夺回瞻榆县；

1932年8月 殿臣部来袭战 700 殿臣部；3500 包围双阳县城之殿臣；

1932年9月 第三次冯占海讨伐战 7000 冯占海，宫长海；1万 包围，攻击吉长地区；

1932年9-12月 苏炳文讨伐战 4500 苏炳文军；2万 败苏炳文于满洲里，迫其退至苏俄；

1932年10月 第二次东边道讨伐 8000 东北民众救国军，唐聚五；2万 肃清东边道一带；

1932年10月 李清海部讨伐 3500 李清海；3000 肃清安达，肇东，肇州；

1932年11月 吉奉龙地区讨伐 5000 三江好，殿臣等；5000 肃清吉，奉龙，间四角地带；

1932年12月 第三次东边道讨伐 5000 2万 讨伐东边道一带之小群集团；

1933年2-3月 热河作战 42000 汤玉麟，旧东北军，民国正规军，救国军；13万 肃清热河县。

南京政府不但援助东北义勇军，还支持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其实，国民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或援助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的意思与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民众后援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援助与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只不过形式上通过民众后援会而已。“于1932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援助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步兵子弹200万发，机关枪40挺，黄色炸药2万斤。”（40）

南京政府在援助抗日义勇军时也是经过仔细思考的，它要辨清这个团体时真的抗日，还是假的。有一次朝鲜革命军的金学奎道南京政府交涉要求给予军费，只因为“未得到南京政府的信任就没有获得结果。”（41）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从各个层面去对待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作出的一些贡献。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公开积极的带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不过它在不同层面上指导与援助了东北的抗日活动，不仅武器弹药，还有经济方面也援助了不少。虽然国民政府当时有非公开化的抗日政策，而且受到很多限制，无法把所有的东北义勇军归纳为统一领导和指挥，但在内面的政策中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层面史不能否认的史实。东北义勇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具体探讨的课题。

最后再谈谈义勇军的“失败”问题。以前很多研究说“义勇军的活动是失败”的，如果说东北义勇军的活动真的失败了，那么如何解释东北义勇军后来又出现的抗日活动？一般学者认为东北义勇军活动失败后，即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有组织的展开抗日活动。如此说明的最大原因，就是为了强调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传达到满洲省委

后，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缘故。但是这样说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不能说明东北义勇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的相关性。若把东北义勇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分开解释，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无法解释清楚，也无法将14年东北抗日活动的整个过程交代清楚。实际上东北义勇军的活动并没有失败，而且与后来的抗日游击队有一定的连续性。

在这个问题上孔令波（42）曾经探讨过，他不同意“东北义勇军失败”的说法，为此他提出四点理由：

一，从人数上看，以东北义勇军55万人计算，在活动中损失24万，占43%，在东北坚持抗日17万占31%，在热河参加抗日斗争10万人占18%，两项合计占49%。

二，从领导上看，特别是主力部队的领导人仍在坚持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义勇军中旅，路军河支队以上领导坚持抗日者至少百人以上。

三，从组织系统上看，日军大讨伐后义勇军并没有彻底瓦解，而是话介为多支较小的队伍，甚至仍保持原来旅，团规模。

四，从战斗行动上，根据日本的统计，1933年抗日活动出动13072次，总人次266万8633人；1934年出动13395次，总人次90万204人；1935年出动39159次，总人次178万3855人。

这些活动主要是义勇军的抗日活动，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到1935年底才有3000多人。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东北义勇军并没有瓦解和失败，而是在继续斗争。

#### 1931年-1933年东北义勇军人数去向及战果综合表（43）

地区 总人数 坚持在东北 退入热河 退入苏联 死伤俘散 投降 共损失 战斗次数 日军损失 伪军损失 日伪共损失

（辽宁省）

三角地区 3万 2万 1万 1万 40 947 1940 2887

辽西 7万 2万 2万 2.7万 0.3万 3万 360 6795 9428 16223

辽南 3万 1万 0.3万 1.1万 0.6万 1.7万 160 2334 1305 3639

辽东 7万 3万 0.3万 3.2万 0.5万 3, 7万 210 2169 8552 10711

辽北蒙边 6万 1.3万 2.5万 1.2万 1万 2.2万 28 746 87 833

小计 26万 9.3万 5.1万 9.2万 2.4万 11.6万 798 12981 21312 34293

（吉林省）

李杜部

冯占海部 10万 2万 2万 2万 3万 1万 4万 400 6793 27712 34505

王德林部 6万 3万 1万 1.5万 0.5万 2万 100 2754 6732 9486

小计 16万 5万 2万 3万 4.5万 1.5万 6万 500 18884 34444 43991

（黑龙江省）

马占山部 10万 3万 2万 0.3万 4万 0.7万 4.7万 179 2152 23217 42101

苏炳文部 3万 0.3万 0.3万 0.7万 1.7万 1.7万 22 21036 2152

小计 13万 3.3万 2.3万 1万 5.7万 0.7万 6.4万 201 23217 44253

合计 55万 17.6万 9.4万 4万 19.4万 4.6万 24万 1499 43564 78973 122537

从上表里德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东北义勇军的早期活动并不失败，虽然有些东北军与一般民众或溃散，分散在当地，或到关内，苏联，不过在东北留下来活动地17万左右的东北义勇军还顽强地继续活动着，后来与东北抗日人民革命军相结合，更积极地展开抗日活动。所以，这个时期地东北义勇军活动与下一时期的活动不能分开说明，应将它置于整个历史的连续线上来分析，这样才能明确的理解东北义勇军活动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和作用。

(1) 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A-1-1-0-21-5，《满洲事变排日排货关系》（一般）第24卷，《行政院密令字第4852号》1931年9月25日，院长蒋中正。

(2) 姚彭龄，《东北党务活动简介》，载《山高水长》第四集，东北抗日五二三蒙难50周年纪念文集，台中，1995年，99页。

(3) 王良，《东北易帜后的党务工作与民众运动》，载《东北文献》10，11卷，29页。

(4) 梁肃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党人在东北的活动》，载《山高水长》第四集，114页。

(5) 梁肃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党人在东北的活动》，载《山高水长》第四集，115页。

(6) 梁肃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党人在东北的活动》，载《山高水长》第四集，115页。

(7) 警察厅特高科整理专案三册里有完整的记录。梁肃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党人在东北的活动》，载《山高水长》第四集，117页。

(8) 王良，《东北易帜后的党务工作与民众运动》，载《东北文献》10，11卷，20-21页。

(9) 陆军省调查班，《昭和七年八月以来满洲剿匪与治安状况》1933年2月，16页。

(10) 思奇，《国民党三中全会》，载《红旗周报》，第57期，24页。

(11) 《申报》，1933年12月18日。

(12) 《满洲日报》，1933年1月21日。第一军团彭振国，绥中一带；第二军团王化一，凌源县一带；第三军团唐聚五；第四军团刘桂堂，鲁化县一带；第五军团高荫周，开鲁县一带；第六军团冯占海，下洼县一带；第七军团何清明；第八军团李某，朝阳县一带。

(13) 《满洲日报》，1933年1月21日。

(14) 辽宁省档案馆，JD-14-2-72，《热警情密九二号》，1934年6月15日。

(15) 辽宁省档案馆，JD-14-2-72，《热警情密九二号》，1934年6月15日，338-340页。

(16) 入满时全员分3个班，第一班于5月3日由北平出发，赴大连营口，在奉天集中分往各指定地点（军事调查组，地方情政组）；第二组于5月5日由北平出发，先于北宁线唐山集合，二人一组入满，在锦州集合后，再赴各指定处；第三班于5月8日由北平出发再天津分成各组入满。

(17) 辽宁省档案馆，JD-14-2-72，《热警情密九二号》，1934年6月15日，336-337页。

(18) 《满洲日报》，1932年7月11日。

(19)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4, 《奉警情密第400号》, 1933年10月30日, 《以南京为据点的抗日反满中韩互助联合会》。地址: 南京申家巷11号励志社内。

(20)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4, 《奉警情密第400号》, 1933年10月30日, 《以南京为据点的抗日反满中韩互助联合会》。

(21)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4, 《奉警情密第400号》, 1933年10月30日, 《以南京为据点的抗日反满中韩互助联合会》。

(22)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4, 《奉警情密第400号》, 1933年10月30日, 《以南京为据点的抗日反满中韩互助联合会》。

(23) 《满洲日报》, 1932年6月14日。

(24)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2, 《热警情密第60号》, 康德元年五月十六日于热河省警备司令部。

(25) 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 D-2-3-0-17, 《间岛及满鲜接壤地方治安情况报告杂纂》(12卷)1934年2月情况。

(26) 《中央日报》, 南京, 1931年11月20日。

(27) 电信第553号(暗)哈尔滨1931年11月8日, 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 A-1-1-0-21-17, 《满洲事变嫩江事件》。1931年11月7日马占山收到蒋介石来的电报。

(28) 《蒋主席致马占山代主席嘉勉我军奋勇摧敌电》1931年11月12日。国史馆, 《东北义勇军》, 30页。

(29) 《蒋主席致马占山代主席嘉勉我军奋勇摧敌电》1931年11月12日。国史馆, 《东北义勇军》, 30页。

(30) 《蒋主席致马占山代主席嘉勉我军奋勇摧敌电》1931年11月12日。国史馆, 《东北义勇军》, 30页。

(31) 《满洲日报》, 1932年5月21日; 28日; 6月8日; 7月3日; 7日; 9日; 9月10日; 19日; 1933年1月1日。

(32) 《满洲日报》, 1932年5月5日。

(33)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2, 1934年7月7日。

(34)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2, 1934年7月7日。

(35)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76, 《邓铁梅最近动静》。

(36) 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 A-1-1-0-21-5(20卷), 《满洲事变排日排货关系》(华北支部), 北平, 《北平第62号参谋情报》1932年10月19日; 《北平第78号参谋情报》1932年10月22日。

(37) 辽宁省档案馆, JD-14-2-308, 1934年8月11日。

(38) 《满洲国警察史》342-343页。

(39) 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 《满洲共匪研究》第一辑, 18-19页。

(40) 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 A-1-1-0-21-5(20卷), 《满洲事变排日排货关系》(华北支部), 北平, 《北平第97号参谋情报》1932年10月30日。

(41) 杨昭全等, 《东北地区朝鲜人民革命斗争资料汇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年, 567页。

(42) 孔令波, 《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斗争结论商榷》, 载《东北地方史研究》, 1992年2-3期, 124-131页。

(43) 孔令波, 《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斗争结论商榷》, 载《东北地方史研究》, 1992年2-3期, 131页。

---

[\[ 打印此页 \]](#) [\[ 关闭此页 \]](#) [\[ 回到顶部 \]](#)

2012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日看日本 版权所有